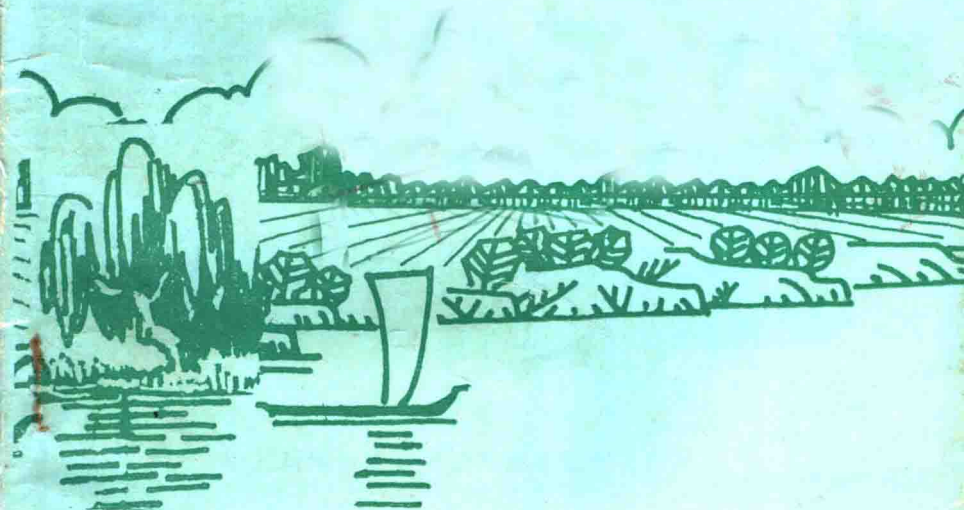


03.12.

新河

清风篇



中共新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

清 风 篇

中共新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

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邓小平

前 言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五周年前夕，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编辑的《清风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是根据现已征集的党史资料编写整理的，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革命老前辈的精神风貌，事迹生动，情节感人，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是进一步端正党风的一面镜子，很值得大家认真一读。

《清风篇》所编入的十二篇文章，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时期的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典型事迹。这些老前辈，有的生长在本乡本土，有的曾在我县工作。在白色恐怖和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们满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仅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在日常工作中表现了大公无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高尚品德。有的克己奉公、不谋私利，有的坚持原则、勇于批评，有的身先士卒、带头赴险，有的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有的秉公执法、大义灭亲，有的立场坚定、视死如归。这些革命先烈、前辈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作风，曾为我党赢得了崇高荣誉，为我们后代树立了杰出典范，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把它很好地继承下来。

当前，在深入开展的理想、宗旨、纪律教育中，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这本小册子当作重要教材，认真学习、对照，从

中受到深刻教育，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一步增强党性观念，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敢于同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以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王永华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目 录

平凡的事迹 光辉的思想.....	范庆稳 (1)
干共产党不能怕死.....	车立成 (8)
心底无私的孙毅民.....	牛国俊 (11)
秉公执法 大义灭亲.....	车立成 (14)
张天一拒收金壳表.....	杨世秒 (18)
马政委批评特殊化.....	车立成 (20)
还帽子.....	池新卫 (22)
革命干部不爱财.....	张文洲 (24)
张光辉不徇私情法办姨母.....	杨世秒 (25)
带头筑“人堤”.....	秦大山 杨世秒 (28)
要政府法令 不要江湖义气.....	车立成 (30)
李敬轩秉公办事.....	张清航 (33)
编后话.....	党史办 (35)

平凡的事迹 光辉的思想

董振堂曾是一个作风正直、追求光明的旧军人，参加红军后，担任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他不仅在指挥作战中机智、勇敢、坚毅、沉着，而且他那大公无私严守纪律、爱兵如子、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质，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吃桃不留头

董振堂对下级官兵，军纪严谨，军法严明。

一九二八年春，他任国民联军第三十六师师长时，率部同奉军在右起大名县，左至林县，长达二百余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激战，历经三个月击溃了武器装备良好的奉军。

战事结束后，正值阴历五月端午节前夕，董振堂带队伍路过河北深县。这里有名的五月鲜桃已是果实累累，压弯枝头，正是下树的时候。队伍从路边经过，伸手可摘。当时天气酷热，一些士兵眼望鲜桃，顿觉口干舌焦，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美感。董振堂担心部队违犯群众纪律，便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谁要偷吃老百姓一个桃，就把脑袋拿来！”结果，部队路过深县时，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一个桃吃。躲在桃树下看桃子的农民，放眼望着远去了的队伍，脸上露出了惊喜和疑惑不解的神情。

家属不能白坐军车

董振堂不仅对部队有严明的纪律，而且严格要求自己，就连自己的家属也不准占公家的一点便宜。一九二八年夏季，董振堂借部队从河北向河南移防的机会，绕道新河西李家庄老家探望父母。第二天，董振堂和随从人员离家时，把十六岁的侄子董光权带了出来，准备让他跟随自己到河南读书。到了道口，要搭火车去新乡。董振堂让勤务员买来一张火车票，交给侄子说：“这是给你买的火车票。你是家属，不能白坐军车，占公家的便宜。”那辆客车后面挂了几节董振堂那个师的后勤车，喂马的知道董光权是师长的侄子，便喊他去搭军车，光权坐在客车上不下来，回答那马夫说：“二叔不让我占公家的便宜。”

坐 禁 闭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参加了红军，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时时处处照着老红军的样子做，带头遵纪守法。一九三二年四月的一天，他在擦拭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枪时，不慎枪走火了。他立刻找到政委何长工说：“我擦枪走火了。”按部队规定，枪走火要坐三天禁闭。何长工说：“你是军长，就不坐了吧！”董振堂坚持说：“不，要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官兵一致嘛！”何长工同意后，董振堂自己抱着被子，到禁闭室关了三天。消息传开，广大干部、战士都称赞董军长是遵守纪律

的表率，对他更尊重了，遵守纪律也更加自觉了。

让病号骑马

董振堂对下级和战士们的政治思想、日常生活十分关心，爱兵如子，特别对伤病员更是关怀备至。一九三二年春天，董振堂率部队从龙岗出发去打赣州，快到中午时下起雨来，道路泥泞难行。经过一块油菜地时，他发现在田边简陋的小竹草棚里躺着一个红军战士，背包、衣服都被淋湿。董振堂随即停下来，高声招呼躺在草棚里的战士。那个战士正冷得难受，不想说话，没有应声。董振堂便走过去和蔼地问：“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躺在这里？”那个战士听到这亲切的问话，才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慢吞吞地说：

“十五军交通队的。病了！”原来这战士是十五军交通队的电话兵，叫汪洪清，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一个战士，因得了“打皮寒”病掉了队。董振堂对这位战士说：“天气不早了，骑我的马走吧！”并让警卫员把这位同志扶到马上去。警卫员扶着汪洪清出了草棚，来到马跟前说：“报告军长，这位同志来了。”汪洪清听说他是军长，非常惊奇，目不转睛地看着董振堂，心想，军长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一身灰粗布军装，一双破草鞋，还背着一支步枪。这哪里象军长呢？过去在白军里的时候，许多当官的穿戴、气派和动不动就骂人的凶象，使人望而生畏。眼前这位首长对人怎么这样和气？董振堂好象看出了汪洪清的心思，走上前一步，抚摸着他的头说：“快上马吧，同志。”汪洪清想，“军长的马能骑吗？”他不知怎么好，左思右想还是不敢上马，惶惑不安

地央求说：“我不骑，我能走。”董振堂亲切地微笑着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是红军，官兵平等，官和兵都是阶级兄弟”。说罢，亲自把他扶上马去。董振堂看到汪洪清忐忑不安的样子，一边走一边主动和他谈话，象妈妈嘱咐儿子似地说：“要注意身体，不要喝冷水，晚上要盖好被子，放哨时要多加点衣服，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太阳偏西的时候，部队停下来休息。董振堂亲自把汪洪清扶下马来，让他坐下，又把身上的水壶递给他，让他喝水。汪洪清想“天下哪有这样的军长呀！”看着董振堂那慈祥的面孔，不禁双眼湿润了。

汪洪清打定主意，再走的时候，说什么自己也不能骑马了。又开始行军了，便说：“军长，我的病好了，能走路了。董振堂摸了摸汪洪清的额头说：“好了怎么还烧得这样厉害？同志！红军可不兴撒谎啊！撒谎是要受处罚的。现在就罚你把马一直骑到宿营地。”说着，又笑呵呵地把他扶上马去。

到了宿营地，董振堂叫警卫员给汪洪清寻面汤喝，天黑时，又派担架把他送回十五军交通队。

捐献私人积蓄

董振堂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睡的行军床上，只有一被、一褥、一毯。身上穿的是部队发的军装和包着皮头的“懒汉鞋。”吃的是简单的两菜一汤。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从不请客送礼，闲暇时除看书之外，无任何嗜好。他每月的薪饷

全部让勤务员代管。下级军官和士兵无论谁有了困难，他总是慷慨地解囊相助，从来不住家里捐钱。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由红五军团十三军政委何长工介绍，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想，加入了共产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要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一生、战斗一生，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一天他找到政委何长工，要求说：“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把它拿出来全部分给战士！”何长工同志劝他：“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就省下这点积蓄，还是留给老人养老吧！”董振堂见组织上不肯收，就坚持说：

“我全部缴作党费吧！”党组织又劝他留下三分之一。经过几番交涉，最后董振堂才同意留下五分之一——将近三百块银元，就是这三百块银元，董振堂也原封不动地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着，自己一个也没有动。遇到干部、战士生病或有困难，就拿出一些来接济他们，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这笔钱。

两 条 毛 毯

一次军委会议后，朱德同志留董振堂吃饭，并请他到自己寝室休息。董振堂看到朱德同志的木床上：只放着一被、一褥，一件褪了色的棉大衣，他想这么单薄的被子怎么能过冬？于是，第二天便给朱德同志送来了自己的一条紫红色的俄国毛毯，并亲手给他铺在了床上。这条看起来极为普通的毛毯，包含着他对朱德同志的敬仰，也包含着他对党、对革命的一片赤诚，朱德同志是不能不收的。这条毛毯，跟随朱德同志粉碎了

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在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这条毛毯又伴随朱德同志爬雪山、过草地，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日子，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的全权代表，经常披星戴月，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陕北的寒冬，朔风凛冽，朱德同志又把这条毛毯转赠给周恩来副主席作御寒之用。后来，在一次前往南京的路上，周恩来同志的汽车行至延安与西安之间的甘泉县劳山村，突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匪徒的袭击，那条毛毯被匪徒砍了十余刀。即使这样，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舍得丢掉这条毛毯，缝补了又继续带在身边。

“七七事变”以后，朱德同志担任八路军总司令。在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恩来同志为欢送这位革命的老英雄，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同志。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天，朱总司令来到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老乡们担心自己的总司令夜里受凉，把火炕烧得热乎乎的。但是不小心，把毛毯烧了一个大洞。第二天，朱德夫人康克清又一针一线地把毛毯补好了。朱德同志带着这条毛毯，转战抗日前线，后又经历三年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条毛毯记载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诚挚的友谊，也是董振堂同志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

董振堂的另一条毛毯献给了伤员。一九三二年春季，赣州战役结束后，他和警卫员小高在从前线返回龙岗的途中，下着毛毛细雨，迂到几个担架队员抬着一个伤员，在泥泞的路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们快步赶上去，见担架队员的衣服全湿透了，盖在伤员身上的东西也全淋湿了。董振堂

问：“伤员是哪个部队的？”担架队员回答：“十三军的。”董振堂对小高说：“把我那条毛毯拿来，给伤员盖上！”小高知道，军长原来的两条俄国毛毯，前不久刚送给了朱德同志一条，只剩下这一条了，仍站在原处，不愿去取。董振堂催促小高赶快拿来，小高说：“就剩下一条毛毯了，给了伤员你盖什么？”董振堂急了，用命令的口气说：“快，你拿来给伤员盖上！我以后再想办法。”这时小高只好从马驮上抽出那条紫红色的毛毯，盖到伤员身上。董振堂又叫小高从布包里拿出两块钱来给了伤员。

范庆稳 整理



干共产党不能怕死

吴子林是新河县孙村（现已改为子林村）人。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〇年在天津市委负责京、津、唐的联络工作，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回新河创建地方党组织并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五年任濮阳县委书记、冀南抗日游击大队第二路第一大队政委，一九三六年三月牺牲于安阳监狱。

吴子林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干共产党不能怕死，为实现共产主义死也光荣！”他在监狱里同敌人作顽强斗争时，就是依靠这种硬骨头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战胜了敌人的残酷折磨，保全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一年春季，天津市委遭受破坏，有的党员被扑牺牲，有的叛变投敌，有的失掉了联系，组织活动一时停顿下来。为了恢复党的组织，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在市委书记黎玉的领导下，吴子林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坚持地下工作。有些人劝他回家躲一躲，他说：“干共产党不能怕死，怕死别干共产党。”他的妻子、长兄、岳父通过天津英租界大同中学的尹沛华，一连寄去几封要他回家的书信，他都置之不理。他说：“家庭可以不要，党的工作一时也不能丢。”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东明西，住处无常。他还经常化装成工人、商人、学生，一次次地避开便衣特务的跟踪盯梢，将党的秘密传给中断关系的党员，并一个个地接上组织关系。有一次，他从住地岳家香店出来，要到赤峰道找一个党员接

躲头，忽然发现一个带墨色眼镜的人跟踪，快走快跟，慢走慢跟，象条尾巴似的怎么也甩不掉。吴子林急中生智，急转弯进一条僻静深长的小巷内拔腿就跑。特务紧追不放，边追边喊：“你跑不了啦，站住！”在这紧急关头，吴子林紧跑几步，假装摔倒，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准备反击。那个坏家伙满以为他不能再跑掉，便弯腰去抓他的脖领子。吴子林大喝一声：“看砖”，一砖将那个特务砸昏，趁机从地上爬起来，又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个特务苏醒过来以后，更加怀恨在心，对吴子林的缉查更加急迫。时过两个多月，吴子林又遇上这个特务，终于被他们绑走，关进天津小西关监狱。

吴子林在监狱里，英勇顽强，坚贞不屈，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敌人的引诱和酷刑。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受谁领导，同伙是谁，还向他保证说：“只要你说出这几个问题，写个自首书，就放你出去。”他坚定地回答：“我是卖油条的，只知道挣几个小钱活命，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审讯他的特务气得发疯，立刻吆喝狱警动刑。开始是皮鞭打、压杠子、灌辣椒水，吴子林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后来，便用烧红的烙铁烫，把他绑在老虎凳上往指甲里楔竹签子，他浑身血肉模糊，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吴子林想：“京津、唐的地下党组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一点也不能叫敌人知道。为了党的事业，我死也是光荣的！”不论敌人使用什么酷刑，得到的只是“不知道”三个字。

天津监狱的特务们，对吴子林毫无办法，最后，把烧得滚烫的黄蜡油，灌入他的耳朵，并以“破坏中华民国安全”的罪名判了死刑。同年九月，将吴子林解到北平卫戍司令部铁狮子胡同陆军监狱，等待秋后处决。

国民党的北平陆军监狱，铁门铁窗，阴森可怕。吴子林是“戴红帽子”的政治犯，被押入死囚牢。天气渐渐变冷，他还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晚上睡在糟烂发霉的麦秸堆里，虱子满身爬。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消极等待处死，而是利用有限的宝贵生命，继续为党多做工作。他把同屋的难友组织起来，给他们讲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讲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道理，鼓励难友们满怀共产主义信念，继续坚持斗争。这些难友们非常愿听他的讲话，都亲切地称他“吴先生”。他还组织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抗议狱警经常打骂、不给饭吃等虐待政治犯的粗暴行为。有一次，一个狱警又在训斥政治犯，吴子林怒火胸中烧，举起手上的铁铐砸在狱警的头上，使他立即昏迷过去。这个狱警苏醒过来，对吴子林开始报复，每天不叫他吃饱，还叫他跪在铁链上、炉渣上。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吴子林的身体更加消瘦，眼窝塌陷，气管炎、肺炎发作，终日咳嗽，特别是布满旧痕新伤的双腿，由于天气寒冷，冻得流黄水，继而溃烂成疮，走路一瘸一拐。他看着伤腿心里想：我不能在这里等死，必须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想办法活着出去，如果两条腿烂掉，出去成了残废，还怎么为党工作？想到这里，他给在北京师大上学的同乡同学靳肇基写了封信，说明自己的住址，要求来见上一面，并带上一身棉衣和鞋袜来。靳肇基收到信以后，立即带着钱和衣物来到监狱，走近牢门一看，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看不清人的模样。狱警连喊了几声，吴子林才从一个角落里慢慢地走出来。靳肇基在牢门口看到吴子林满脸血痕，蓬乱的头发，破烂单衣上的斑斑血迹，赤着青肿的双脚，不禁放声大哭。吴子林坦

然地笑笑说：“哭什么，我这不很好吗？能够见到你，我就很高兴。”靳肇基想说什么，吴子林摇摇头，指指自己的耳朵说：“耳朵灌了黄蜡，什么也听不见。你给‘家里’捎个信：就说我在这里。”他趁狱警不注意的时刻：压低声音说：“我没有口供，什么也没招认。”靳肇基点了点头，表示领会了他的心意，留下钱和衣物便出来了。

靳肇基将吴子林住监狱的消息带回来以后，经过在北平的同乡同学和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在当年的十月，吴子林终于被保释出狱，随即又投入了紧张的地下工作。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逢发展新党员谈话时他总说：“你怕死不？怕死别干共产党，干共产党不能怕死！”这话一直流传到今天。

车立成整理